

陈寅恪儒学观之思想理路透视

曹 景 年

(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 陈寅恪的儒学观大致包括 3 个方面,其一,儒家之道为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价值,是必须坚持的;其二,高谈抽象的精神学问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学通过吸收佛教思想,为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是将来中国文化复兴的关键;其三,儒家之道的涵义在于尊崇道德气节,贬斥势利。陈寅恪不但颂扬,而且立身行事无不践行。

关键词: 陈寅恪; 儒学观; 抽象之通性

中图分类号: B07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8)04-0038-04

引言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他学识广博,治学精深,其研究成果对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主要精力多用在史学考证方面,而对思想史哲学史较少关注,如其所言:“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1]863}又云:“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853}

但实际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问题上,陈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深刻性足以跟专治思想史者相媲美。尤其是儒学方面,近代关于儒学的讨论实在是甚嚣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陈先生虽然没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也无意参与那些争论,但其在一些文章中对儒学的历史现状以及优劣都有明确的判断,还关涉到立身行事的问题。从中可以发现陈先生的观点对我国的儒学研究还是有很大启发的,本文拟就陈先生的儒学观作一述论,以求教于方家。

—

儒学作为先秦时期出现的一种学说,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虽然它有很多历

史性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略嫌过时,但它还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本精神,而它的根本精神是必须要坚持的。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陈先生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郈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1]845}。按《白虎通》卷八详论“三纲六纪”之义,三纲者,“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六纪”是“张理上下,整齐人道”的总纲,三纲的理想是刚柔相济,阴阳和谐,即所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六纪的理想是“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2]

以上所述都是极为抽象的理念,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而儒家学说甚至整个中国文化无不是围绕这个“三纲六纪”的理想而展开的,所以,陈先生提出“三纲六纪”为中国文化之定义,貌似偏颇,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以为然,认为“三纲五常”都是封建糟粕,怎么可能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呢,认为“天人合一”等等才是,其实那都不是本质的东西,真正的中国文化其实就是“三纲六纪”。这种抽象的理念,即陈先生所谓道,所谓仁者,是一种通性,这就说明,从根本

收稿日期: 2007-11-29

作者简介: 曹景年(1984-),男,山东济宁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

上说,它是古今一贯的,而且还是中外一贯的,不但中国需要,整个世界都是需要的,是绝不能废弃的。正如吴宓在1961年再次见到陈先生时感叹的:“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世界。”^{[3]143}所以对世界也有裨益,正是因为它有一种通性在里面,即所谓的永恒价值。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理念被公认为具有永恒的价值,而中国文化中也有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对研究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陈先生把这种通性归结到儒家的礼制上。他对礼制一直十分关注,并做过专门的研究,他的名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篇就是论述礼制的渊源。陈先生认为儒家最重要的东西就在于礼的学问,礼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东西。

陈先生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体现。”“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他举例说:“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儒家之教训,故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1]841}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完全在于它外在化为具体的礼制,更方便于实施,对大多数人来说,儒家即是制度规范,是礼教。

礼首先是进退揖让等世俗之礼,这是礼的最显性的表现,但这些东西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也就是说具体之礼制因时代之不同是不可避免要变更的。谈到清季的形势,他明确指出:“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会经济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1]845}

他从清末社会的大动荡中看到了具体礼制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永远保存的,而是要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改变,但礼制并非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与形式,而是有其“本”的,这个本就是道,就是仁,正如孔子所说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4]185}这个本就是陈先生所说的“抽象理想之通性”,而这是不会变的,也是应该坚持的。钱文忠先生也说:“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

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5]10}就是说儒家之礼制的根本精神必须遵守,这是根本,是体,绝不能废。

陈寅恪这种特殊的礼制思想使他区别于顽固的守旧者墨守传统的一切东西,抱残守缺,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使自己的生命仅仅系于一姓之兴旺,一种制度之盛衰,旧制度的灭亡在他看来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他经常说他从来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团体,平时也绝少参与政治事件,他是一个用特有的冷静眼光观察历史的人。

二

陈寅恪特别强调了道德理想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强大,必须要有一种精神上的抽象学问,即所谓的形而上学来作为支撑,这也就是他所讲的“抽象理想之通性”。将之放在中国的古代学术环境当中,就是宋明新儒学津津乐道的“天理人事之学”,这种学问抽象,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对各种问题的一个根本解决。他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太过关注现实,只重视实用的东西,而“不图精深之救药,势必致人欲横流,道义沦丧。”^{[3]19}其实探究天理人事的学问,自古以来就有的,司马迁就以“究天人之际”为其目标,邵雍也说:“学不际天人,不足谓之学也。”代表了宋明儒学追求形上哲理的心态。

但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从一开始产生,就以现实社会和人生为其思考问题的核心,现实感十分强烈,而缺乏这种形上之思,陈寅恪说:“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专趋时用者,则乏远虑,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短处即实事之利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3]10}这里的孔孟之教不是指整个儒家,而是特指先秦儒家。陈先生对包括孔子儒学在内的先秦学术评价甚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3]10}就是说,中国哲学的形上之思在先秦是很不发达的,但是后来的宋明新儒学却具有了高度的思辨性,并为陈先生所大加称道。陈先生把新儒学的出现称为一大事因缘,他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传衍而已。”^{[1]853}

①天水一朝指宋朝,因宋朝国姓赵氏的郡望在甘肃天水,故以天水称宋朝。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天水一朝^①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1]871}又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而宋代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新儒学的产生，可见他对宋代新儒学的认同及高度评价。陈先生认为，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顶峰，虽然现在中国衰落了，但并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是宋代文化的复兴，“终必复振，譬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1]867}先生对新儒学寄予的殷切希望，于此句话中表露无遗。

宋明儒学所具有的思辨特征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其究竟来自何处？陈先生对此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新儒学实际上是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而产生的。

佛教传入中国便以它特有的精密理论风行南北，而使中国的原有学派儒道二家相形见绌，韩愈曾辟佛，就是因为佛教在社会的影响已经逐渐开始超过儒家，所以儒家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学问，而佛教中精深的义理之学正可以补救中国旧的儒学的缺失。陈先生曾举例说明佛教实为宋明新儒学的先导：“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之前，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1]841}他又具体分析程朱吸收佛教义理建立新儒学的逻辑过程：“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3]11}把宋明儒学对佛教既批判又吸收的心态揭露无疑，但并不因此对之持鄙夷态度，因为其行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是有功劳的，十分符合他所主张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妄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观念，因此，他由对新儒学的崇敬进而转到对其思想资源——佛教的崇敬。他又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

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 Thomas Aquinas，其功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惟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3]11}对宋元时代的文化成就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对过去人们把宋元时代看为黑暗时代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而这都要归功于佛教的帮助。

在道教方面，他认为新儒家所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1]841}“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也。”^{[1]841}但是道教本身就吸收了很多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成了新儒学的一个先导和范例，他说：“综观二千年来道教之发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之刺激，而所受外来之学说，要以佛教为主。”^{[1]516}故新儒学所受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佛教。

由此可以看到陈先生独具特色的既有开放性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观。他认为，中国文化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通过思想史的考察认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妄本来民族之地位。”^{[1]841}这就是他一贯主张的“中体西用”，与过去守旧顽固派对“中体西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三

陈先生强调儒家的抽象性，突出儒家所具有的通性之道的作用，而他所认为并要求坚持的儒家之大道，就是尊崇道德和气节，贬斥势利小人，这正是真正的儒家仁圣所极力提倡发扬的。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1]851}所谓的古今“仁圣”自然是指儒家的道德高尚、气节独拔之士，他们是摆脱世俗利益和欲望，引导世道人心归之淳正的楷模和精神力量。如他所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871}

其实，他认为不仅是那些标榜儒士的人，一般

的人,甚至是女子,只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和气节,都是应该表彰的,这使他事实上摆脱了后世儒家之迂腐教条的束缚,而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来坚持儒家的理想。先生晚年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6]137},因为他看到了传统的士大夫已经严重腐化和顽固,被名利二字冲昏头脑,失去了儒家本有的精神面貌,变得可恶和可憎了,“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3]9}而在那些被人忽视和轻视的女子中,却不乏崇高伟大之人格。

先生在论到《再生缘》的思想时说:“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1]319}这段话使人认为他是极力反对“三纲”的,这就与前面所说的赞同“三纲六纪”相矛盾了,其实产生这种疑问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陈先生的意思。《白虎通》所说的“三纲”是抽象理想,是根本精神,但是后代之“三纲”已经根本违背了它的本来精神,变成排斥自由,束缚人心的枷锁,是要“摧破”的,所以,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才更为陈先生所珍视。在另一部类似的著作《柳如是别传》缘起中,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1]144}他正是要通过为一个女子立传来表彰道德和气节,贬斥迂腐和势利。

陈先生对时事的变幻看的很淡,那些世人无谓的争论,他不屑去理睬,但他并非对现实漠不关心,

他最看重的还是世道人心。对于一些激进的改革者与一些时髦的理论,他说:“九县三精,飘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1]335}在他看来,民主论者虽然时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风俗颓败,道德沦丧,也不值得去讨论。而对于一些旧势力的沉渣泛起,他尤其痛恨:“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1]335}他不在乎是民主还是君主,他关注的是如何来挽救“廉耻道尽”的让人痛心的情形。

四

对于儒家思想,陈先生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也有在思想上的提倡和尊崇。其关于儒家礼制的研究,对现在如何继承儒家思想很有启发。他对抽象理想的追求和强调,事实上揭示了一个真理,即一个民族只有精神强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强大起来,民族的精神就像一个指路明灯,引导人们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这正是我国现在所需要的。陈先生不但提倡儒家之道,而且处处践行之,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这是至关重要和至为难得的。在《赠蒋秉南序》中,他对自己一生的行事进行总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1]371}这正是其气节的真实写照。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4]95}陈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批判和打击,但其立场从未改变,依旧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正是传统儒家的气节之士所为,也因此为后人崇敬,陈寅恪虽然不是纯正的儒家学者,但其对弘扬儒家思想却有莫大功劳。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373-374.
- [3] 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 [4]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 [6] 陈寅恪. 陈寅恪诗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下转第 54 页)

- [2] 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 [3] 李昌麒. 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36.
- [4] 蔡磊. 非营利组织对国家干预失灵的克服 [A]. 单飞跃, 卢代富. 需要国家干预经济法视域的解读 [C].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276.
- [5] 雍灵. 经济法视野中的公平 [D].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30.
- [6] 沈宗灵. 现代西方法理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20.
- [7] 厉以宁. 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51.
- [8] 沈宗灵. 法、正义、利益 [J]. 中外法学, 1993(5): 9-11.
- [9] 李昕. 公平与效率: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目的 [J]. 法制与经济, 2006(6): 9-10.

Substantive Fairness: Economic Law's Pursuit

CHEN Ni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Law pursues substantive fairness, reflects the value of liberty and equity. It takes "result" as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whole interests" as measure standard. Economic law doesn't object formal fairness,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supplement to it. The result fairness which economic law pursues is a kind of relative justice, not absolute justice.

Keywords: economic law; justice; substantive fairness; formal fairness; result fairness

[责任编辑: 刘健]

(上接第 41 页)

An Inspection on Chen Yinque's View of Confucianism

CAO Jing-ni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Chen Yinque did not specifically study Confucianism, he was still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His view of Confucianism includes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ideal of Confucianism is abstract and universal, which has eternal values and should be upheld. Second, he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irit science. Through absorption of Buddhism, Neo-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established a genuine metaphysics for Confucianism, which i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 key to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e core of the ideal of Confucianism is to respect morality and integrity and denounce snobbery. Chen Yinque not only sang high praise of this ideal, but also practiced it through his deeds all his life.

Keywords: Chen Yinque; Views of Confucianism;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abstract

[责任编辑: 李世红]